悼紫阳

芦笛

昨天在坛子里看见，紫阳同志大概不是死了便是病危。无论此讯真假，作为政治家的紫阳其实早在１６年前就寿终正寝了。所以，尚未盖棺就来悼念，想来也不至于失之过早吧。

从个人荣华富贵的角度看来，紫阳在１６年前干的那档子事，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果他不毅然站出来反对武力镇压市民学生，早就作了"转正天子"了。如今太上皇们死绝死光，当然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气焰薰天、炙手可热的"神州牧"。以他的资历、才干和在改革开放中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只怕要变成继毛、邓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如今病危，定然要牵动亿万颗焦急的心，一旦病逝，还要备极哀荣，全国人民如丧考妣，哭声震天，痛悼"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死后更入享太庙，世世代代让子民跪拜......又岂会如现在般冷冷清清，还要有人出来冷言冷语，说是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正是放胆卸磨杀驴的好时机，使用价值耗尽的老驴早断气一刻，新贵们也才能早一刻放下提到嗓子里的那颗心！

然而就是这一"失足"，使得紫阳和其他中共领袖划然而别，成了中共领袖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第一人，终将以中共第一位爱民领袖的名义进入青史。

"赵紫阳"的名字，我早在文革前就知道了。那时他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我是《羊城晚报》的热心读者，经常在第一版上看见他的名字。６０年代万象肃杀，全国报纸统是一个模式印出来的，唯一功能便是包咸菜。但《羊城晚报》极富知识性、趣味性与娱乐性，在当时那种"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情势下一枝独秀，读之令人耳目一新。现在回想起来，这应该说是紫阳"天生反骨"，早就流露出"自由化倾向"的迹象吧（"自由化"在中国居然会成了 high treason 一类的大罪，当真是我党造出来的人间奇迹）。

再次听说此人，是老邓在文革后期复出，大搞"整顿"之时。当时紫阳持着老邓发的尚方宝剑，简派四川，大刀阔斧地实行全面整顿，短期内就使濒于崩溃的经济迅速回升。"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就是那时流行起来的。

及至四人帮倒台，老邓第三次复出，紫阳和耀邦便成了他的左膀右臂，在与顽固派的权力斗争中为老邓冲锋陷阵，先是把"新四人帮"汪、陈、吴等人驱逐出局，后又迫英明领袖华主席辞职，耀邦成了党主席（后改任总书记），紫阳成了总理，迎来了"解放"以来中国政治局面最开明、最有希望的时代。

就在紫阳进入中央书记处时，报上登出了他的履历。我一看大为吃惊：原来老赵在那老人党里竟然如此年轻！算来他当广东第一书记时也不过四十多岁，大约是当时最年轻的封疆大吏。其时泽民还在作小员司，敬爱的锦涛同志就更不必说了。和后两位无产阶级马屁家不同，紫阳似乎是靠自己的才干上去的，他无论是抚粤还是治

川，乃至后来入阁当揆，都政绩斐然，颇有口碑。

正如我在批判八九学运的旧作中反复指出的那样，胡、赵当家的８０年代，是中共执政以后最宽松、最光明、最有希望的黄金时代，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就是在那时出台和酝酿成熟的（例如后来的股份制就是如此）。没有当年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也就决不会有如今的经济奇迹，那么今日中国也就只会是困在陈云笼子里的那只半死不活的呆鸟。就连把紫阳打下去的老邓都不能不在南巡讲话中亲口承认，如果没有那些年的工作，后来中国经济也就决不会上那个大台阶。

可惜因为社会转型不但引起经济阵痛，更导致意识形态混乱，由此引发了莫名其妙的学潮。八九学潮初起，我的心情就无比沉重，预言了紫阳的没落。记得当时我对某访问学者说：

“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人民不识抬举，只配让老毛收拾。三天没人打就浑身不自在。上次学潮把胡耀邦闹下来还不知悔改，这次还要把老赵也搞下来才舒服！真ＴＭＤ生贱了！”

我更进一步预言道：

“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看来没有什么希望。最大的难题是人民不配合。如果自由派上去，放松对人民的控制，人民就要起来闹事，在客观上配合保守派把自由派打下去，实行铁腕统治，于是天下从此太平。”

这话其实早就说过了。在回忆录《黑崽子》中，我记录了１９８６年学潮中我的个人经历：

“接着一场政治风暴就爆发了，几乎使我出国的努力前功尽弃。１９８６年秋，安徽省某大学的一些学生为选举学生代表和校方发生争执，学生们诉诸该校校长方励之。方煽动学生起来闹事，告诉他们民主不能靠上面恩赐，只能通过斗争赢得。学生们响应了他的号召，起来‘斗争’，并将方的号召通过信件传播到全国各地大学去。我校学生应声而起，上街闹事，向当局‘争取民主’。尽管他们对民主一无所知，但他们全都知道那是某种奇特的法宝，能使他们所有的个人问题于瞬间内消解于无形。

对这无理取闹，我至为恼怒。看来上帝铁了心要惩罚我们，因此每逢事情有了点转机，他就要送下个孙中山来毁了一切。邓的改革面临着强大的阻力，风险极大。当初全靠老干部的支持，他才得以重返权力中枢。但老干部多是死硬的毛主义者，他们支持老邓上台，不是想让他改造中国，而是指望他照管他们的利益。但邓在文革中自己和家人的遭遇，使他从忠实的毛信徒变成了愿意突破僵死毛教条的改革家。他精明地赎买了许多老干部，让他们体面地退了下来。尽管许多死硬派拒不下台，他还是设法把胡耀邦和赵紫阳扶了上去。随着这两位比较年轻的改革家进入权力中枢，改革事业便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组织保障。看来只要再过２０多年，老一代死硬派统统死光之后，一个自由的中国就很有可能诞生。

如今这“民主闹剧”正好 played into the hardliners' hands，因为它在老干部眼中构成了对政权的威胁。那些人一定会将此归咎于邓的改革，指责改革乃是招来灾难的祸根。为了证明他对党的忠诚并保住自己的权位，邓就会牺牲他的左膀右臂来绥靖死硬派，使大有希望的改革事业遭受挫败。

不幸的是，我那些同事们中，竟然无一人能看出这最彰明较著不过的事来。相反，他们无不同情学生，因为他们自己就为物价飞涨、工资菲薄、腐败现象开始出现而怨气满腹。他们不知道物价上涨乃是改革必须承受的代价，而腐败并非共党发明，其实历来就是使社会得以运转的永恒中国生活方式。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腐败有助于将老干部及其子女从封建贵族改造为资产阶级大班，这其实是一种社会进步。

明知徒劳无益，我还是决定出来反潮流。一天上课前，我告诉全班学生，我想对他们的斗争讲点个人看法。我首先强调指出，校方并未派我来作这工作，我不过是为良心驱使，不得不发言而已。我告诉他们，中国今天正处于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时期。我们的责任是让它变得更好，而不是毁去这大好形势。接着我就给他们讲了俄国作家谢德林的寓言：

‘池塘里的一群青蛙对自己没有国王而牢骚满腹，反复鼓噪抱怨：“上帝啊，您怎么如此薄待咱们？谁都有个国王，偏偏就我们这群青蛙没有！”

上帝听得不胜厌烦，便随手扔了个原木进去。那木头轰然自天而降，吓坏了的青蛙们无不噤若寒蝉，乖乖臣服。但没多久他们又大失所望，因为新来的国王不言不动，什么本事都没有，胆大之徒甚至敢跳到国王身上去大跳康康碰头舞，而国王依旧一筹莫展。于是青蛙们又鼓噪起来，抱怨上帝亏待他们，派了个如此无用的国王给他们。

上帝实在腻透了蛙们的鼓噪，于是便派了只鹭鸶去。新来的国王见了子民们，有一个便吃一个，来两只便吃一双。死寂从此笼罩了池塘，幸存的蛙民们无不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为上帝总算给他们派来了个神威凛凛的国王而无比欣慰。’

最后，我噙着眼泪、以绝望的真诚呼吁结束了这番演说：

‘同学们！好好想想这个故事吧！你们还年轻，中国的许多事你们还根本就不明白。千万别干那些令亲者痛而仇者快的蠢事！作为过来人，我恳求你们仔细想想我的话，求求你们了！’

那群黄口孺子根本就不懂我讲了些什么，下课铃一响，他们便蜂拥而出，兴高彩烈地去加入早就在街上叱咤风云的同志们。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寓言变成预言。几天后，随着最开明的总书记胡耀邦丢官去职，喧嚣一时的学运骤然烟消火灭。１９８９年，学生们又起来了，这一次他们不但成功地闹倒了另一位开明领袖赵紫阳，而且给了当局一个残暴屠杀的借口。自此以后，幸存下来的蛙民们一直在那个池塘里默默地享受新王给自己带来的幸福生活。”

我对那位访问学者说那番话时，还是８９学运乍起之机，学爷们还在"哭庙"，哀悼被他们闹下来的胡耀邦。正如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我虽然"不惮从最坏的角度想像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那惊天动地的愚蠢"，那想象力还是太贫乏了。人民岂止是不知与党内自由派配合的问题，简直就是专门和那些人过不去，必欲把人家搞下来，这才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８９学运至今被老外和许多国人盛赞为什么不得了、了不得的"民主运动"，其实任何一个脑袋没有被万吨水压机压扁、被高速气锤打晕的正常人都该看出，那完全是一场反改革示威，完全是针对改革造成的副反应诸如通货膨胀、腐败全面出现等等宣泄怨气，从社会意义上来看完全是反动的。

运动一开始，斗争矛头便对准了党内改革派特别是其领袖邓小平和赵紫阳。我那阵在国外看到学生痛砸"小瓶"的消息，气得把再教育中学会的脏话统统骂了出来尚不能解恨于万一。

但凡没让脑膜炎（亦即毛共党文化）毁了大脑的同志都该明白，改革之所以能在神州大地上全面铺开，根本就不是什么"人民斗争"而是"明主恩赐"的结果。改革根本不是什么"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更非什么"历史潮流"，完全是老邓逆党心民心一意孤行，基本是他的个人作品。

老芦从社会底层爬上来，和工厂的穷哥们一直保持着血肉联系，也认识几个老干部，深知改革是怎样触怒了从工人阶级直到党官僚等大多数社会成员，说是"天怒人怨"也毫不过分。从中央到地方，老邓和他的部下一直是以寡敌众，当初为对付四人帮和文革新贵，与那夥"老而不死是为贼"结下的权益婚姻早已破裂。所有党国元老中，主张改革的也就只有老邓一个孤家寡人，日日面对陈云、彭真、李先念、薄一波、"小超"等人的威胁。因为老邓捏住了实权特别是军权，那些人无法发动宫廷政变，但人家可是深通"清君侧"的传统把戏，首当其冲的就是邓的大将赵紫阳。

自出国后，我一直在阅读海外各种反共杂志，发现香港出的《争鸣》特别有参考价值。该杂志的记者们大概认识某些高干子女，披露出来的共党内幕常常是惊人的准确。早在１９８８年，该杂志就一直在泄露赵紫阳地位不稳的消息，如今学运势必把这位总书记推到是非第一线，强敌环伺之中，稍有不慎，立刻就是粉身碎骨。

最可笑的是学运居然把他和他之后的老邓当成了打击对象，把邓朴方的光华公司和赵公子大军"倒彩电"当成了"钢鞭材料"。这种闹剧都有本事闹出来，只证明我对中国人民的观察是何等入木三分：对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来说，咱们喜欢的其实是"廉洁的铁腕"，绝不能是"腐败的宽松"。闹事的学爷和后面可能有的"长胡子的黑手"怎么就蠢到连这昭如日月的事实都看不出来：您要真把这俩人打倒了，改革不也就寿终正寝了么？请问中央除了这几个人，还有谁是改革派？遮莫您指望陈云同志去开办经济特区，抑或把整个中央掀到一边去，由方励之出任太上皇，吾尔开希任总书记，柴玲任总理？

当此之时，如果老赵以自家权位而不是国事为重，最聪明的策略就是实行伟大领袖

的教唆："因势利导"，指出学运的反改革实质，将这烂账算到保守派头上去，把它说成是保守派的阴谋诡计，以捍卫革命事业、维护党的权威的高姿态出现，抢得先手，争作"平暴"先锋，在镇压了学运后，将清洗延续到党内去，趁机除去那些死硬派。如此则不但可以转危为安，而且能进一步从组织上保证改革的持续发展。

如果老赵采此策，则绝对只会有胜无败。楼下有网友引用外国观察家的Ｐ话来驳我，意思好像是无论是否有学运，老赵都得下台。这种Ｐ话，也只有对我党毫无认识的同志才说得出来。其实稍知我党的同志都该知道，"政绩"从来就不是主导干部升迁的标准。８８－８９年中国确实出现经济过热，so what？能跟９３年老邓南巡讲话发表后引起的经济过热相提并论么？请问那次又有谁引咎下台了？锦涛同志现任党国一把手，请问有谁又说得出他小人家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政绩？

谁都知道，在我党，选拔干部的第一条标准从来不是什么才干或实际政绩，而是"忠诚"。老赵成了保守派的眼中钉，并不是他的改革措施导致经济过热，而是因为在那些人看来，他背叛了共产党的基本原则，疯狂走资。但只要老邓铁了心支持他，那些人其实并不能把他搞下来，这道理前面已经说过了：老邓捏着实权特别是军权，而我党从来是靠拳头统治的。

然而紫阳并没走这条既安全又明智、而且能确保改革大业不被孺子加胡子们颠覆的道路。相反，他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应该以和平手段，通过法制渠道去求得学运的合理解决。

就是这一主张铸就了紫阳的厄运，同时也使他成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伟大领袖。

如我在旧作中反复指出的，我党实行的乃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最野蛮、最血腥的政治制度。我党"理论"的最荒谬之处，恰与如今海外伪民运的政治立场一般，乃是"朕即人民"的等式。根据这一等式，党的领袖代表全党，而党代表人民，因此，只要任何人胆敢和党有异议，立刻便失去"人民一分子"的资格，亦即自动失去公民权。处理的方法只有一个，便是无情镇压，无论怎么残暴都是应该的。

由此，我党发展出了"屠民有理论"和"屠民治国论"，那主张就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安居乐业，必须杀掉一部分人民，只要实现了"安定团结"这个至高无上的目的，则屠杀人民就绝对是 justifiable 的。本坛网友随便先生就是该"理论"的最热心拥护提倡者，他不但以９１１那种非常事件来"证明""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必须杀掉一部分人民"，甚至还苦心孤诣地发展出所谓"狼羊论"，诬蔑我党是为了满足私欲而滥吃百姓的凶残豺狼！

这种谬论之所以长盛不衰，甚至在相当数量的国人中得到默认，似乎只说明了痞子党对人民智力的败坏已经到了何等令人发指的地步，而中国社会又倒退了有多远。

哪怕是传统社会（亦即文盲们通常说的"封建社会"）的君王们，也从不曾在梦中想出过这种无耻的屠民理论来。漫说历史上从未听说过君王悍然镇压和平请愿者们的烂事，哪怕就是武装暴乱，朝廷还常常分为"剿"、"抚"两派，前者主张军事镇压，后

者主张和平解决。历史上有大量的造反痞子被招安做了大官的例子，其中最有名者当数黄巢大将朱温，他在投降后改名"朱全忠"，最后做到后梁的开国君主。

然而在我党统治下，别说是武装暴乱，就连和平请愿、示威，无论如何确有原因，也一律被当成旨在推翻政权的暴乱，解决的方式永远只有一条：残暴镇压，其后的"逻辑"非常简单："我是人民，你反对我，你就是反人民，对人民的敌人就只能坚决镇压。"

任何一个文明人都该看出这种"理论"的荒谬：所谓"人民"，从来是由各种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阶级、阶层、集团等组成的乌合之众。"人民"竟然可以变成某种纯净的、均一的（homogeneous）实体，其利益可以由某个政党全面彻底地代表之，这种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智力笑话，也只有我党才有本事发明出来，也只有毛共的嫡派传人伪民运人士及其同情者至今还在网上乐此不疲地贩卖。

因此，哪怕是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府也必然会因某些政策伤害了一部分选民的利益而与之发生冲突。只要是执政党，与人民发生冲突就是免不了的。正确的应对措施，是将这种冲突法制化，纳入法律的轨道，使得人民的怨气有正常的宣泄渠道，其合理诉求能得到及时解决。就是通过这种合法的信息反馈，政府才能相应调整政策，使之能轮流照顾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也就是西方民主国家如此稳定，达几百年而不动摇的根本原因所在。

可惜我党那个"朕即人民"的反动公式，却从根本上否定了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着冲突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把所有反对政府某些政策的言行统统当成叛国罪加以镇压，于是便从根本上封杀了决策的反馈渠道，杜绝了政府自我完善的可能。

这结果，是由我党打就了一把威力无穷的巨锁，把人民和政府永远锁死在潜在的敌对关系之中，从根本上取消了政府和人民良性互动的可能。它当然营造了"安定团结"，可惜那不过是高压锅制造出来的假象，因为没有"溢洪道"，被蓄住的洪水便只能逐渐在坝后升高，等待着日后破堤而出。

换言之，我党给人民的"选择"，便是"要么俯首帖耳作奴才，要么扯旗造反当响马"的"两分法"。历史上还从未见到过这种自绝于人民的蠢事，然而它却竟然成了我党执政半世纪的国策！

紫阳同志的伟大，就在于他在中共领袖中第一个看出了这种祸国理论与实践的荒谬，想突破陈腐的党教条，另创新路，尝试以西方方式去解决官民冲突。不幸的是，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远没有老芦的深刻，看不到这举动太超前，远远超出了国民特别是所谓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在当时的国情下根本就没有什么"朝野良性互动"的可能，做这种尝试，绝对只会步大多数超越时代的先知先觉的后尘，不但闹个里外不是人，还要摔得粉身碎骨。

正如我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不是英雄是恶人》、《争作布衣"帝王师"》等旧作中反复指出的，毛共党文化对全民智力的败坏是全面彻底的，不但党国官员、就连百姓特别是愚蠢绝伦的所谓"知识分子"，也从来没有"双赢"、"忠诚的反对派"等起码观

念。政府对人民采用"非敌即我"的两分法，人民对政府同样也采用这种划线方式，其态度永远是在"奴才"和"响马"两极中振荡，绝对不会有什么慎重有节的建设性态度。党群关系早让那把锈锁锁死了四十年，老赵既没有孙大圣的"解锁法"，又如何能解开它？

事态的实际发展就是如此。根据西方学者的专著，紫阳从北韩回来后，了解到学运的实际情况，当即去找老邓汇报，提出根据法制原则和平化解学运的主张，老邓让他说服了，同意他去试试看。于是他便通过部下阎明复等人去向学领们作工作，同意建立政府与学生的对话渠道，争取圆满解决他们的合理诉求，请学生顾全大局，撤回学校。

任何一个在"新"中国长大的人都该知道，建"国"以来，我党还从未做过这种骇人听闻的重大让步。如果学领们知道好歹，见好就收，同意阎明复的要求，迅速撤回学校，将朝野对话就此变成常设制度，由此摸索出一条在专制国家实行朝野良性互动的新路，那就是对和平改造中国立下了不世奇功，将为后世子孙代代歌颂。

这是从宏观角度来看。从微观上来说，如果学生应命回校，学运于此消解，则紫阳也就为我党解决学运问题立了大功，以实践证明了他的正确，在党内的地位顿时便能得到极大加强。他可以趁机顺利抢占道义制高点，居高临下地回击保守派，以学运得到和平解决的事实，指责那些主张镇压的死硬派是谎报军情，危言耸听，欺骗中央，企图玷污我党爱民如子的清白名声，甚至可以藉此把陈希同辈清洗出去。

可惜，任凭阎明复如何说得唇敝舌焦，几乎如老芦８６年一般，到了声泪俱下的地步，学爷们的铁石心肠却绝对不会软化。柴玲女士在她的历史证言里，把"吾尔开希被阎明复的慈父形像感动"当成"投降派"的罪证，就最生动不过地说明了主导支配当红学领的究竟是什么"民主思想"。

紫阳的致命失误，是他没有认识到，投身学运的那些青年和其背后可能有的胡子黑手，是在晚期毛共党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晚期毛共党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所谓"革命的坚定性"。它不但不能容忍政治立场的不同，就连同一阵营中的策略歧异都不容许存在。说穿了，他们的"革命运动"就是愚昧到令人不敢相信的"骨气大赛"，谁的嘴最硬、最不知妥协、最耻于"食共粟"。谁就能击败竞争对手，如柴女士一般脱颖而出，跃升为领袖。这就是柴女士要反复在那历史性证言中谴责"学生特务"、"投降派"、"野心家"的原因。

可笑的是，如今这"骨气大赛"已经搬到海外论坛上来，开展得无比轰轰烈烈了。过去茉莉女士在此坛多次卖弄她"耻食共粟"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且不说，新近还有草虾先生因东海一枭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大义凛然地痛斥之。最有趣的是，"老鸟"还连赞对方骂得好，因为"老鸟"之所以能在网上扬名立万，靠的就全是卖弄这"骨气"，您让他怎么能扔下这安身立命的"生命线"、"幸福线"呢？自然只有牙齿打落了往肚里吞也。

所谓"民主"到了中国，竟然会沦为宋明理学一类天下最没有容忍度的滥货，谁说咱中国人没有创造力呢？

就是这"道学民主"，决定了学运必然成为颠覆紫阳、进而全面挫败改革大业，倒拨中国时钟的反动运动。紫阳是倒在保守派与"民主造反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正如倒在长街上的那些无辜民众一样。直接凶手当然是兽党兽军，但学领们绝对是客观上的帮凶。

学领拒绝撤出的话一出口，紫阳的厄运就已铸就。我党和历史上的统治者共同的一条，便是把自己看成是封建家长，人民只能作２４孝。世上哪有中国父亲向儿子低头的？如今"父亲"做了这种史无前例的重大让步，"儿子"还不依不饶，那面子上下得去么？

最大的问题还是，此事一定诱发了老邓心中深重的 paranoia。我党的发家史让他深信世上绝对没有什么单纯的自发的学生运动，他这辈子经历过的群众运动包括学运在内，又有哪一场后面没有我党操纵（不包括他没赶上的五四）？文革经历更使他对暴民政治深恶痛绝。此时学生这种乖张背谬的举动，一定让他深信学运后面就是有政治势力在操纵，其目的就是要推翻这个政权。这就是学生那种怪异举动的唯一说得过去的解释。

吊诡的是，老邓这么想，其实并没有一般人想像的那么错得离谱，因为学领确实把党国政府看成了敌人。试问柴玲辈若不把政府看成敌人，怎么会使用"投降"、"招安"一类只能在对敌斗争中使用的话语？难道公民对本国政府还会存在这种"气节"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谣传老邓说什么"退一步就全完了"，我看完全有可能。

悲剧就在这儿：冲突双方都没看出，自己是陷在了我党的"斗争哲学"的死胡同里出不来。

这其实是说了又说的老话了：我党的"斗争哲学"，本来是专门设计出来去颠覆国民党那个执政党的。有趣的是，我党在自己做了执政党后，竟然会昏聩到去手把手地教全国人民学会这把戏。在那本教科书中，凡是"妥协"、"退让"都是"变节"、"投降"、"怯懦"、"背叛"、"出卖"的同义词，而"斗争"就绝对只是最机械、最僵死、最死硬、最道学的"对敌斗争"。等到党民发生冲突时，人民自然就只会本能地使用这套把戏去对付我党，想都不用想就把《红岩》一类烂书上学来的童子功使了出来，下意识里就是把我党当成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敌人。于是冲突双方便就此成了过河卒子，双方都没有后退功能，撞上了就跟武侠小说中的高手比拼内力一般，只能以生死决胜败。

悲剧在于，学领们虽然在潜意识中把党国政府看作敌人，却绝对没有推翻它的动机、设想、计划，遑论决心、能力与行动，他们只是始则为"胜利"冲昏头脑，继而不知如何体面而且安全地下台而已。那夥人不过是群乳臭未干、Ｐ事不懂、激素分泌空前活跃、精神狂躁骚乱得一塌糊涂、半疯不癫的"挺能杰儿"，犯这种低级错误毫不足奇。怪只怪咱们过去有全民崇拜儒生的传统，后来又由老毛把"革命小将"吹到了天上去。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再加上我党那个阴谋诡计党党魁们的阴暗心理发作，最后的结果就是如鲁迅所说，学生和市民们口中没有毒牙，却在印堂上贴上了"蝮蛇"的字样，引来了杯弓蛇影的乞丐的打杀。

即令情势如此恶变，紫阳仍有自救余地。"议和"不成，他只需引咎自责，迅速转舵，转过来作"平暴"积极分子，仍然部分保留权位，不至于如后来那样一抹到底。至不济他也可如乔石一般，投弃权票就完了。邓共有别于毛共的一大进步，就是对党内持不同政策主张者一般并不以铁腕整肃。所以老赵如果此时深自韬晦，完全可以做胡耀邦第二，并不至于弄到丧失人身自由的地步。但他在议和失败后还坚持反对镇压。这问题就严重了。

最致命的还是他此时犯了个无法挽回的大错，也就是在亚银会议上把老邓当家的党内机密泄露出来。世间纷传这是鲍彤给他出的馊招，此说真假与否，局外人当然无从判断。可以肯定的就是这绝对是致命错误。

类似的致命错误是赵的那伙"智囊"此时上窜下跳，把政府机关的一大批人弄到街上去示威。"体改办"那伙人最扯淡，著名白痴"政治学者"严家其居然写出篇烂文字来流布海内外，公开声讨"皇帝"邓小平。这完全就是给紫阳下催命符了。

当然，后面这件事可能是那伙人事急时自作主张，未必是老赵自己的意思。但无庸置疑，此举和老赵在亚银会议上公开卖邓那一招加在一起，从此便注定了赵的毁灭。

此中荒谬，不待智者而后知。邓本是赵在强敌环伺之中唯一能为他保驾护航、让他免遭元老毒手的后台，而邓则需要赵这种忠于改革的干材来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两个人其实是给捆死在改革这根绳子上的蚂蚱，谁离开谁都不行。老赵昏聩到居然去自断经络，全不想想他就算真能把老邓搞下来了，难道与军队毫无渊源的他就能镇住大局？光一个李先念他就招架不了，更别说共军那伙悍将了。

此举一出，邓赵之间就再没有修好余地。共产党人最推崇的美德就是忠诚，最痛恨的大罪就是背叛主子。不仅如此，此举更加重了老邓的疑心并促成了他的杀机。如果说他过去对镇压还可能有什么犹豫的话，那么此时那决心是再不会改变了。赵的"出卖"以及其部下的跳梁，一定会让他坚信那确实是有党内势力介入的旨在推翻他的统治的"动乱"。最后公开的紫阳的罪名是"分裂党、支持动乱"，这大概就是那时老邓给定的。

说来可悲，紫阳此误，无论是否鲍高参之过，其实都是拜我党教育之赐。大概他们看到了学运那轰轰烈烈的声势，产生了"民心可用"的错觉，以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紫阳和那些利令智昏、被自己呼风唤雨的神通冲昏头脑的学领一样，都是毛共党文化的受害人。

凡是在大陆长大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不可救药的"拜民教徒"，以为所谓"人民"真是伟大领袖说的"上帝"，能派神仙下凡把太行王屋二山搬走。凡见识过文革那种暴民运动的同志，恐怕没谁不会对人民群众"改天换地、摧枯拉朽"的神力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不知道，暴民只有破坏力而无建设力，即使是破坏力，也只有在绝对权威指挥下，在以众暴寡、对付毫无抵抗力的弱者时才能释放出来并奏效。

如果光从表面上看，文革中老毛的确成功地利用了暴民来改朝换代。但那成功的前

提，首先是他在文革前借助林副统帅把自己造成了上帝，其次是枪杆子紧紧捏在他手里。暴民不过是他放出来的一群狗，去咬毫无还手之力的乞丐而已。如果倒过来，用暴民去对付枪杆子，则绝对只能是肉包子打狗。而这就恰好是８９年夏季发生的事。

如今再度追思往事，我不能不为现代中国人丧失起码智力和常识到了何等地步再一次深感骇异，想想看：上到党总书记，下到吾尔开希、柴玲之类跳梁小丑，竟然一个个如同中了邪法似的，以为中国人民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难道他们学毛著时就只看见讨好愚弄人民那些媚俗马屁，没看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难道他们活那么大，竟然连不须费吹灰之力，扣一下扳机就能打死人都不知道？那些人不都是大学生么？怎么一个个都成了义和团那些无知农民？

党宣传对全民智力的摧残，当真是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最无奈的还是，即使紫阳有心利用人民，人民也不会买他的账，当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晚期毛共党教条熏陶出来的"儿童团"们别的长处没有，这"革命的坚定性"可是从不紧缺。人家从小就听熟了"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绝对忌讳的就是"被招安"，"出卖学运"，这调调儿可是柴玲女士那历史性证言的主旋律。透过那历史文件，不难看出当年那学运完全是"骨气大赛"，专门选拔"硬嘴"（约等于"硬骨头"）。不管你地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只要一被指为"出卖学运"、"接受招安"、"投降"，立刻就得从领袖的高位上跌下来。柴英叉不就是专靠那"硬嘴功"和"揭发投降派功"上去的么？

所以，无论从那方面来看，紫阳都是个悲剧人物，那悲剧决不仅仅在于他个人的得失荣辱，甚至也不在于无辜受屈，而是在于共产党中国的政治人文生态大背景，决定了他必然要成为人民斗争的错误冲击对象，决定了他根本就得不到自己想保护的人民的谅解和认同，决定了他用文明方式解决朝野冲突的尝试必然落空，决定了他的部下想挽救危局的一切努力都只能适得其反，悲剧还在于紫阳虽然是党内难得的先知先觉，是我党内睁开眼睛看世界、尝试进行文明化的第一批人中的佼佼者，但他毕竟还是个半新不旧的过渡人物，这才会犯下最后那个错估形势的致命错误。

当然，紫阳毕竟在风云莫测的宦海中浮沉了一生，要说他事后仍然对自己的致命失误一无所察，恐怕不大可能。我想，他肯定知道大势已去，血洗京城已成定局，只恨自己无力回天而已。而这大概就是他一生最大的痛苦。

在这点上，紫阳最后一次露面非常耐人寻味。如所周知，他跑到广场上去，老泪纵横，说的话字字暗藏机锋。什么"我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云云。依我的解读，那完全是暗示学生，中央已经决定举起屠刀，他本人也已凶多吉少，他反正老了，死了也没什么，但学生年纪轻轻犯不上贴进去。因为这是党内绝密，他当然无法直接说出，只能用那种曲折隐晦的方式暗示之。那群低智商学爷听得满头雾水，赶来监视他的李鹏却岂有不明白的？自然要恨得咬牙切齿，此后他特地把此事当成了赵的一大罪状，发表在《人民被日报》上。

就是赵的这次最后表演，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其实我也知道，"洪洞县里无好人"。

在陶铸治下，广东"土改"左得出奇，完全是血流成河，紫阳既能在宦途中窜升那么快，手上没有血迹是不可能的。而且网友燕南人先生还在此坛揭发过他的屠民大罪，但不管怎样，他毕竟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先行者之一，亲手把比较文明的生活方式带回了共党中国那个超级野蛮国家。在执政的最后一年，他能有足够的胆识试图突出"屠民治国论"的陷阱，并尽己所能阻挡即将砍下来的屠刀，在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之后，还能以待罪之身，不顾严重政治后果，亲自出面警告学生。这所作的一切应该完全能够将功折罪了。

当然，紫阳是个非常复杂的悲剧人物，不是我这个草民票友可以盖棺论定的。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他的功过。历史上的是与非、功与过，常常并不是如愤青们眼中那样黑白分明，一目了然。

例如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挺身出来"为人民鼓与呼"，在后毛时代一直得到史家的正面评价，但新近有人出来说，如果彭不出来这么闹一下，不伤了老毛的面子并引发他根深蒂固的疑心病，庐山会议可能就会按原定方向去"纠偏"了，那后来也就不至于饿死那么多人。尽管我对彭元帅此举一直深怀敬意，但也不能不承认此说非常有理，并不是可以靠肾上腺就能轻易驳斥的。

类似地，紫阳当初出来反潮流，从道义上来看当然是正确的，可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呢？说到"功利"，良心家们一定深恶痛绝，可所谓"道义"，说到底，不也就是人民的长远利益么？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紫阳此举，到底是对人民有害还是有利？

这问题当然不可能得出准确答案，因为要探讨就得引入虚拟：当初紫阳如果采取不同的决策，对今日中国的政经形势会发生何等影响。虽然违背我朴素的道义感，我仍然觉得，或许，紫阳当初的决策并非最佳决策。无论是从人民还是党国的长远利益来看，紫阳保住权位都要比丧失权位有利。这道理很简单：改革随紫阳而去，紫阳既黜，改革也就名存实亡，唯有尸居余气了。自紫阳以后，由泽民而锦涛，于今中国终于一步步完成了向左转，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而这才是紫阳陨落的最大民族悲剧所在。

紫阳的倒下，引来了一连串的厚重回声，８０年代的黄金时代就此结束，直到今天中国也没从那损失中恢复过来。不仅如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还得生活在那个巨大灾难留下的阴影中。

最明显的挫败当然是组织上的。随着紫阳被黜，整个改革派一垮到底，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纷纷流亡国外，顽固派大举卷土重来，《人民被日报》散发着时空倒错的气息，读来恍如文革中出版的报纸。１９８６年耀邦被黜后，是紫阳出来力挽危局，首先出来声明要保证政策的延续性，这才顶住了死硬派的反扑。如今改革派全军覆没，再也没人出来这么干了。"姓社派"甚嚣尘上，一直要到３年后老邓忍无可忍，通过南巡讲话对中央发动攻击，威胁"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才部分地扭转了局面，造成了经济改革再也无法逆转的客观现状。

更大的损失，是"改革"从此变了味，它再也不是全面改造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新运动"，却成了单纯的"实业救党"的"俄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也就是在

绝不改变腐恶政体的前提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成了改革的实质性大方向，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为我党坚持下去。

此前，政治改革本来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党政分开"、"党退出企业"等重大改革措施都在紧锣密鼓地筹措之中。据戴晴女士披露，政治局当时甚至准备修改宪法，把"四项坚持"拿下来。

如果说老邓那实用主义的灵活头脑以前还不排斥此类政治实验的话，那么，学运的发生以及代价惨重的屠杀（其实哪怕是从我党利益来看，大屠杀的代价也是极度惨痛的），以及紧接着发生的苏东巨变特别是罗马尼亚首脑齐奥赛斯库被处决，便使得政改成了中共首脑讳莫如深的碰不得的心病。

这还不是最坏的恶果。８９学运的兴衰，意味着"屠民治国论"全面的光辉胜利。

正如事实雄辩证明了的，紫阳之所以失足，在于他误把共党统治多年的人民当成了通情达理、可以协商沟通、达成理性妥协的平等对手，不幸对方却如同那些当年海禁初开时，初与洋人打交道的满清官员，只懂"实力"一门语言。当他们自觉大局底定、捏住了当局的７寸之时，一个个慷慨激昂，"吾以吾血建中华"，"畅谈革命斥贼党，揭谎言，明真相，驱迷雾，迎曙光"，与国家总理对话时，那气焰比美国驻日本总督麦克阿瑟还嚣张，一旦发觉大事不妙，小命岌岌乎危哉，"硬嘴功"便在转瞬间变成"飞毛腿功"，硝烟未散便跑到了洛杉矶。

这结果，便是让朝廷无师自通，未经老芦教诲，便学会了本文开头引用的那则谢德林寓言，悟出全国人民其实不过是那个池塘里的青蛙，如果作木头便得被他们骑在脑袋上，如果作鹭鸶则万籁俱寂。换用数学公式来表达，便是："让步＝毁灭"、"镇压＝太平"。

这，说到底，就是网友随便先生"狼羊论"出笼的时代大背景。而温总理在去年六四前夕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指出当年中央的决策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其实无非也就是指出了过往１６年的实践证明了屠民确实有理，确有必要，确实是为治理中国所必须的"霹雳手段，菩萨心肠"（按，这是随便网友跟在燕南人网友"赵紫阳一怒斩刁民"文后的赞美诗）。

可悲的是，多数人民竟然同意（起码是默认）了这一伟大理论，而更可悲的是，尽管决非紫阳初衷，在客观上，他也确实为这理论的昌行作出了贡献。

一方面，他推行的经济改革在延时效应过了之后，终于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奇迹般腾飞，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空前繁荣，使得"青蛙们"在心满意足时，很容易就忘记了昨日的屠杀，更把先发生的"屠杀"，当成了后发生的"经济繁荣"的原因（按：此乃国人固有的"思维"毛病）。另一方面，紫阳本人被他想保护、想依靠的人民颠覆的悲剧，也证明了对"刁民"实行"怀柔"政策确实不符合现代中国国情。

不需要多少智力就可以看出这种"理论"一旦变成根本国策后的可怕恶果。朝野之间的互动，从此只有"狼"与"羊"之间血淋淋的"吃"与"被吃"的方式。一个丝毫不必顾忌

民意，可以尽情为所欲为的政府，如同没有刹车的高速运行车辆，迟早要一头扎进深渊里。

因此，无论是从确保改革大业进行到底的角度，还是从预防"屠民治国论"变成根本国策的角度来看，紫阳当初不顾一己安危，挺身而出反对屠民，似乎都不是最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决策。

如果他当初力主有节制的镇压，先使出"拖"字诀来，采取"晾干"的消耗战术，根本不理睬那些丑类如何跳梁，以此耗去学生青春骚乱期的荷尔蒙，等到学运不再是全社会注意焦点后，再使用"四五方式"，派有限部队自地道入城，在夜深人静时突入广场，以大棒伺候那帮狗男女，打得他们鬼哭狼嚎，抱头鼠窜，做梦也不敢再回来，与此同时更派武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那夥学领悉数逮捕法办。如此则不必死人就能使运动烟消云散。

在我看来，这就是冲出"民主造反派"与党内死硬派联手给他布下的绝境的唯一办法。如果他真在中央内持此主张，同时再在政治局会议上使出"硬嘴功"来，唱一番"必须旗帜鲜明地制止反对改革的动乱"的高调，则即使最后无法做到适度镇压，那起码也为改革派保住了阵地，不至于被那夥黄口孺子彻底颠覆。

这当然是事后诸葛亮之见。漫说当局者迷，就算是不当局者如老芦，虽然早就看出了运动的悲剧结局，但那无非是个粗线条的轮廓而已，根本就不可能预知事态的具体发展。例如我早知道政府会镇压，但那只是理性作出的判断，内心深处其实不愿相信，因此当屠杀一旦发生时，我还是不可避免地被那赤裸裸的血腥与残暴震惊得目瞪口呆。

更何况紫阳虽然是党内少有的先知先觉，毕竟不可能完全超越其经历的限制。公道地说，他的决策错误完全是仁者之失。此类失误，完全不影响他作为超越了时代、超越了自己、率领国家从蛮荒中毅然步向文明的第一个中共领袖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死人从来是活人的利用对象。紫阳辞世后，必然会变成各式各样的政治势力的利用工具。其中最热心的孝子，恐怕会是那些当初把他颠覆了的"民主"垃圾。这也毫不足奇，对那些政治动物来说，哪怕是死后，紫阳的政声口碑仍然可以被他们化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进行"余热发电"。或许他们还在梦想以此事件再触发一次六四，却不知道中国人民就算再蠢，也早就看腻了"从硬嘴到飞毛腿"的无耻表演，再不会有人为这些小丑火中取栗了。宁作我党"奴才"，不作"民运"野心家的炮灰。

紫阳弥留之际到底想些什么，当然只有上帝才知道。但如果我是紫阳，在撒手人寰之际，我只会想起柴女士的历史性证言，稍加改动之后，作为自己最后说出的话语：

"以方励之、柴玲、吾尔开希之辈为领袖的中国人民，你不值得我为你牺牲！"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日写毕于屠龙技痒斋